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戏曲小说卷

# 儒林外史

(上)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戏曲小说卷

# 儒林外史(上)

—清—吴敬梓—著

周月亮—整理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学工作室



## 前言

万贯家私荡然无存的吴敬梓，终日对着钟山发愣。回首逝去的似水年华，回味擦臂而过的人、事、情，阵阵凄凉过后，不禁莫名一笑，一个人经历了多少苦楚才换来一点明白，焉能及身而绝，敢不供诸同类，让他们多一只眼睛来看取这时间隧道中转眼成空的一切，何必在厕坑中翻了筋斗才悔不当初？

吴敬梓的出现意味着文化知识人作为真正的叙事人（而不是代言人）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文人以文人的视界、价值标准来打量这个世界，用文人的语言、叙述策略来描写“故事”并反思故事本身。这种文人自觉言述的话语活动使中国小说走出了帝王将相、朴刀杆棒、才子佳人、发迹变泰等媚俗的窠臼。也因此，这部伟大的奇书是还有着浓厚的“三国气”“水浒气”的国人读不懂、不想读的，鲁迅那句“伟大也要有人懂”的名言就是为《外史》抱不平的（《叶紫作〈丰收〉序》）。胡适说：因为“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

最不广，但这部书在文人社会里的魔力可真不少！一来呢，这是一种创体，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儒林外史》也素被视为中国的社会小说之祖。

有趣的是李伯元以降的自由撰稿人的讽刺小说是在骂朝廷无砍头之虞了才蜂起“批评社会”，而且因为敢骂了，便漫无节制、顺着性子跑马，遂成为在报纸上连载完便与时代的浪潮一并事过境迁的读物，没有着意开掘人性，破坏了讽刺艺术的界限，从而永远屈居模仿经典的附属地位。而《外史》反而百读不厌，代代人都能从中找到“通常的人生的回声”，甚至古代评点家的喟叹至今依然有效：“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卷首）

因为，《外史》的取境和立意绝不跟着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民间流行的市井心理走，而正是来“反思”这地久天长的活法的依据并追问其合理性的，而且除了《红楼梦》，没有哪部中国古代小说富有《外史》这样的——人性的尊严、明白的理性、深切的疑问。

## 一

《外史》是一部找准了十八世纪士人及国人情绪的大书，它用平实而自然的手法来写一串、一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相逢与离散，勾画出一个可以名之曰“精神遭遇”的大故事，支撑这个大故事的基本冲突是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矛盾，再简化一下便是“文化与现状”的矛盾，用得上今天走俏的话头：全面展示了人文精神的遮蔽与失落。整部长篇的内在张力是称得上社会良心、人类理性的知识者处在汪洋大海一般的“流行文化”包围中那挣扎不出来的呐喊。

“流行文化”是个丑不忍睹的称谓，它的内容则更丑：一是八股、二是假名士、三是全民皆兵般的趋炎附势的势利见识。在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还靠口耳相传构成声气的古代社会，这三类流行色以铺天盖地的普遍性构成令作者痛心疾首的文化现状。所谓文化记忆，主要是对原儒风范的记忆、对纯正的礼乐文化传统的记忆，对所谓“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理想士子的追忆。之所以说是记忆、是追忆，就是因为作者环顾神州士林，到处讲究的是揣摩逢迎的考校、升迁



调降的官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纱帽之天下！

八股文化大昌于天下盖因为纱帽召唤着那些八股士，他们舍生忘死地去挤那一条独木桥，竞相比赛“揣摩”工夫，以举业为生命的终极停泊地，成为被八股吸魂器吸干了气血的空心人（如著名的周进、范进），国家却以三场得手两榜出身者为真才，作者指出：这其实是场双向误解。士子误以八股举业为安身立命的基地，为飞黄腾达、实现自我的津梁，是一种“舒服的误解”，发过、中了的自然舒服透顶，就是不中、未发的或做馆（如王德、王仁）或操选政（如马二），都有献身不朽之盛业的“崇高感”，马二先生总以为自己在起草政府文件（第十三回），卫体善、随岑庵则宣布他们的评选标准才是真正的文章标准，单是中了还不行（第十八回）。马二太虔诚地误解了八股的属性，卫、随二人则是在自欺欺人。他们都可能反思这种圣贤复出反而考不上的“代圣贤立言”的考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国家以利导义，施行功令教育，确实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来研经制艺，然而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便于打分的文体，它的好处在于操作简便，可以使“踩分点”趋于量化，然而一旦用它来一锤定音（列为头场的《四书》八股文一旦成为落卷二三场的考试往往便白干了），便出现了许多怪现状，小而言之许多真才落榜，大而言之使儒学原典变成文字游戏，从而彻底扭曲了原教旨、遮蔽了儒学的真血脉，使广大读书人大面积地遗忘了文化传统。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主流文化的“胜利的失败”！

假名士则是“空头文学家”一类人物，他们是这个古老帝国语文传统的寄生者，那个语文传统供给他们“精神资源”，让他们编织“诗”是一切的幻觉景观，他们本是玩感觉的闲人，却当起了相当活跃的文化明星，互相封赠大名士的称号，满怀着天下谁人不识我的良好感觉，欣欣然以为名士比进士享名多矣（十七回）。误解是他们的上帝，他们一旦走出误解便七宝楼台塌陷、一无所有。追求仿古的湖州名士看清了所谓的人头原来是猪头后归于沉寂（十三回）。扬州那批斗方文豪的名士气焰被“盐捕分府”的一条链子一索而光（第十八回）。南京以杜慎卿为领袖的名士搞了一个选美大会便各奔前程。他们的诗性、浪漫性等等只是种“玩”性，一种有多大本钱做多大买卖的把戏而已。那个淹滞的社会既没有给这类文化闲人保留什么惬意的高位，也没有淘汰他们的机制，他们可以在官场和乡村之外的“社区”——有“文化生活”的城市中自我陶醉、尽情地靠着想象力来转败为胜。长篇正文的最后一回单写“呆名士妓馆献诗”，不仅相当漂亮地给名士结了账，还天才地预

告出名士加妓女的模式成了下一时期的流行色，至少可以这样说：晚清那名士加妓女模式的小说不胜枚举，叠印出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命运。

古老帝国的组织结构犹如一块夹心饼干。名义上，士为四民之首，其实却只是官——民这两大片饼干所夹的那一小点“心”。不管士林堕落与否，都难成为表率一方的真正的乡绅，如果他们既无权又无钱的话。实际情形是谁有权势、谁有钱财便是真正的乡绅。士人竞奔纱帽，围着权转已成传统，已不值得大惊小怪。尤令作者愤怒的是士人居然围着商人转、当他们的干篾片，被金钱所左右“非方不心、非彭不口”，致使神州沦陷为一个“五河县”，作者便按捺不住，变小说为杂文，直接出面来唾骂了（四十七回）。

这个现状事实上已宣布了这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颓波已成颓心难挽。尽管每一代人文主义者都有“人心不古”自古而然的发现、同时又有“于今为烈”的浩叹，但是吴敬梓这次写出了令人绝望的“发现”：人人都活在误解中，人人都是失败者。人们在忙忙碌碌追逐价格的同时背弃了价值，各种莫名其妙的误解使其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障碍中、陷入人与社会的双重脱节中，好坏正误都失去差别，这个世界没准了，荒谬无益的伪妄、铺天盖地的实利、实用主义，使得阴暗隐晦的价值虚无主义突然全面开花，空前通行又畅销，像过了明路一样的理直气壮。

用斯宾格勒的话说：一个失去了文化的民族已不成其为一个民族，只是“一堆人口”。

## 二

对付扭曲最富杀伤力的办法就是反讽。反讽的定义多矣，但其基本属性在于它是把两刃剑，能一棍子打两拨人。面对文化与现状的双重问题，制度与人性两方面的毛病，反讽便成为贯穿长篇的一个基本态度、基本手法。

若用简单的二分法来处理，则沉沦在现状中的文化人是伪妄的愚人或奸人，而沉湎于文化记忆中的便是高人、高士了。吴敬梓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力写出了个中未必然。最典型的具有文化象征魅力的是杨执中一案。二娄作为今不如古、城不如乡、官不如民的专职闲谈家本应



该受到寻找、重建文化记忆的作者的礼赞，他们的人生姿态与风格的“原型”还有着作者本人的一些影子呢，但作者对他们照“讽”不误，他俩与杨执中那场“误中缘”，甚至可以视为作者在隐喻式地讽刺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迷古的一代对文化传统的误解心态。二娄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据确认杨执中为旷世高人，正是自己要追觅的那种文化状态的体现者。杨执中把自己耽于读书、以无用为高的脾性当成古典文化的真脉遗存，这是一种有益的误解、从而很可能是一种故意的误解，因为这样一来，杨执中便可以反败为胜、有理有据地活下去了。他还能将权勿用由一个时文士劝说为仿古士，足见“文化记忆”在荒村野店中犹有余热。然而他们那“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却对付不了五百钱惹出来的麻烦（十二回），冲虚古拙的高人既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更不能指示什么文化前途。应该说杨执中比扬州那帮假名士更像传统文人，他身上还残存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哪怕这仅仅因为他身上还有乡土气的缘故。当然他只是个把犬儒当真儒、反朴未必归了真的待沽而不得售的废物，犹如他手中那把无用的铜炉。

显然，被杨执中“记”住的文化传统完不成“为末世之一救”的使命。这一脉传统固然讲究超越势利风习、并蔑视商业性活动，但一味推崇虚养、贱实务、以幻想为生，也太“形而上学猖獗”了。最终成为高不起来的高人自不待言，就是国家发给薪水、资金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去“高”又能有多高？又能高到哪里去？这个蹈虚的传统不但无法抵御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势利风习，反而恰恰为这种风习畅通无阻让开了跑道。当然，这只是我们的遐想，作者什么也没说，他只是从容蕴藉地用那种“具体写实、总体象征”的笔法来写“故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娄三顾杨氏草庐的故事理当成为世界级的反讽经典。反讽水平可以与杨执中一案等量齐观的还有马二一案、杜慎卿一案。马二这条亢龙难以跳出枯窘的境地，杜慎卿才情过人、追求喝彩，然而只是以风雅的庸俗代替平凡的庸俗，在那精彩的追求不俗的动作背后是最平庸的媚俗情志。他们身上的“文化”就是“现状”。

就是为反抗现状而矗立出来的“思想的雕像”——贤人和奇人，也同样肩负着反讽，而且还是连环套一般的反讽。首先，遍被华林的势利风习、在朝在野的八股士、假名士大军把他们推为“孤岛”，在这个对比中被讽刺的是那些名利的奴才、道德上的残疾人，而不是他们，作者也正是要让他们形击那些虚妄小人。然而不幸的是，那帮无耻、无聊的丑类活得蓬勃昂扬，而他们却活得很无奈，他们那份心明眼亮的内省精

神也只够让他们无奈而已。这对他们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其次，他们担负着势与道的对立、现状与文化的矛盾，这本是人文主义者的宿命，即使失败了也虽败犹荣，至少当个悲剧的主角，然而，他们却并没有成为挑战的标志、进攻的嚆矢、失败的凯歌。大贤虞博士像孔夫子一样“穷讲究”，却没有了孔夫子内圣外王的内在张力，只剩下了一团暮气沉沉的“古老性”。“千秋快士”杜少卿有侠客一样的“不在乎”的豪气，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作为。作者绝对没有讽刺他们的立意，然而却写出了他们被讽刺的命运。第三，如果说“势”开“道”的玩笑固然让人气闷还不至于让人绝望的话，那“道”本身让人泄气便是“最后一枪”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贤人奇人所共同持有的“基于礼的超越意识”，只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逃逸而已。贤人对古代礼乐文化的复辟意欲本是一种“伟大的误解”，太相信道德理想主义的教化功能了。他们并不是盲目乐观的热病患者，他们像几乎自知失败是不可避免一样，无论搞大祭、还是应征辟都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派头，当作者在颂美他们的“通脱”时实际上在描述着他们的逃逸冲动。虞博士是一派游世的逃逸，庄征君则是享有特权的无路可走就地成仙者。杜少卿以浪掷家产为代价从天长逃到南京，摆脱了食客却又入了词客的包围圈，最后又终于从南京逃走。沈琼枝主动出击却成为一个坐实了的逃犯。最后所添的琴棋书画四客，本是作为理想精神薪尽火传神不灭的象征人物出现的，也是作家能想起来的最好的人生姿态，然而却是连事业也不追求的极度的解脱者，可名之曰消极防御的逃犯。这最后的“苍凉手势”深切地宣布了：文化已从社会舞台退位，变成仅由个体生命呵养的气功了。

### 三

文化颓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语言的贬值。而一部《儒林外史》又是一部儒林内外的人在说话的“史”。像那些室内电视剧只是在磨磨叽叽地说话一样，《外史》中人也“什么鸟儿出什么声儿”般的在那里嚷嚷。而且正是那此起彼伏的“聚谈”支撑起这个“精神遭遇”的大故事的。可以在不尽准确的意义上借用一句现代大话：语言就是世界观。我们区分贤人、奇人、八股士、假名士们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他们的言述品质，因为在那个谁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的生活圈里，几乎唯有言



述品质体现其文化品格了。

战国时期策士们的四处游说是一种“话语的权力”，两汉清议、明末社党中的党人议论别是一种“话语的权力”，就是魏晋名士的清谈，也是“微言一克”，偏偏《外史》中的士子们，除了贤人偶有正声、奇人发些高论，剩下的都是“废话一吨”，吹牛撒谎，胡支扯叶，除了俗气入骨的恶谈就是无聊的闲谈，总之都是瞎扯淡。这醒目的退化大势至少昭示了士子从中心到边缘这样一个不可驳回的失败命运。

策士那一言兴邦一言亡国的政治威力是早已消失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宰相以下都是只准给“一姓”来打工的打工崽，但清议始终是士子干城卫国的用武之地。但清廷文化专制手段之博大与恶辣是空前的，《外史》中士人之萎缩也是被“治”成的，就是品地最高的贤人、奇人也发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革命”大声音。最惦记着要“替朝廷做些正经事”的迟衡山提议：“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算是最嘹亮的士人宣言了（第四十九回）。他们只能以明哲保身、儒者爱身的态度来躲着走、走所谓自己的路。庄征君劝卢信侯别再收求高青邱文集素来被认为是披露文化恐怖气氛的着力之笔。呜呼，他们大约一生都生活在类似我们的“文革”岁月中。要维护所谓的读书人的良心充其量就是不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做梦也不敢像东林党人那样说话的。如果说贤人的这种退化情有可原，那名士的退化也有令人悲悯的因素。

遥想魏晋名士要么是高官、要么是皇亲国戚，再等而下之也是衙内、将军，他们尽管不得好死，却处在政权中心的漩涡中，都是《外史》中那些平民名士如景兰江、季苇萧们难以沾边的世界，唯二娄、二杜是贵族后裔，然而他们除了诗酒风流还能做什么？当然清代自有真且大的名士，像王渔洋、袁随园等，然而他们只能去讲诗词作法了。若将《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与晋人谈玄的文字稍加对读，便会感叹：士种退化何以一至于此？晋人那一套核综名实、辨名析理、动静生死、有对无对、言意之辨，对清中叶的儒林文苑来说差不多是天方夜谭了。更莫说《外史》中那些地方性的小而假的名士了。原因首先在“制度”：政治、思想上大一统之外桎梏、理学之内在理路上的内桎梏，还有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的八股法，等等。大文化滑坡个中人焉能翻出池外？他们无须讨论什么有无、为与不为了，现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无所作为。这就像秃子不用再理发一样。

沦为边缘人之后，士人后退一步天地宽，作斗方玩戏子随才器使，

帮闲揩油吃白相饭，不一而足。然而他们的话语系统没有多元化起来，反而越发和光同尘、随俗从众、做村妇闲谈科了。那些吹牛撒谎的假名士不是与胡屠户、乌龟王义安们如出一辙么？就是谈书本也“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同。”（三十三回）贤人区别于他们的地方正在于贤人有“追忆”经史典章、保持古典文化精神的情志，于是两类人生活在不同的视域中，贤人奇人有古典文化学养从而能够登高望远，表现出通脱超拔的哲人风姿，而假名士、八股士则因失去了这个背景从而过高的估价近在眼前的东西，成为在厕坑中翻上翻下终日忙碌却出不了粪坑的可怜虫。

八股士、假名士那些像长疯了的花草一样多的蠹言妄语综括起来说就是：把官方“给定”的话语或市民“给定”的话语变成自己的话语，从而把自己彻底给定化——封闭起来，成为振振有词的“哑巴”。他们那“废话一吨”湮没了贤人、奇人那“微言一克”，貌似人文的东西遮蔽了真正的人文的声音。尤其是那帮假名士虽生在非信息社会，只能靠自我感觉来度日，但他们颇像与商品逻辑同流合污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据批评这类“知识分子”的中外学者描述，这类“知识分子”胸无定则，既没有学术思想资源，也谈不上坚守如一的信仰，却总在追求最大化的“明星轰动效应”，实际上只能成为社会噪音的制造者。这种文化群体不可能有什么深度感，因为他们失去了文化、历史、甚至生命之根。他们在“进步”中退化。

## 四

吴敬梓对这个世界周身充满自相矛盾的特性太敏感了，就像他必然选用了反讽一样，他必然选取了抑制高潮的叙述策略。而且这个叙述策略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反讽意图、贯彻了反讽精神。

吴敬梓一反已成了说部传统的传奇写法，他用平实的语言写最平实的故事。当作者对描写对象失去内在感觉和兴趣的时候，他便找个合适的借口转入下一个。这是《外史》中人邂逅相逢转而各奔前程、突兀来去而无什么性格成长史的原因，也是《外史》的舞台在流动、情节起迄只靠幽丝单气就把球传下去的原因。作者对经营什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之类人工景观不感兴趣，面对流逝的生命与生活，他便干脆



来个“流水账”。情节结构无高潮、人物命运无高潮、叙述意向无高潮，叙述语调除了极少例外都是低调，这在古代长篇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奇迹。素被视为全书高潮的大祭泰伯祠其实并不是高潮，不比三起名士大会写得好自不待言，而且也不比它们高且大，而且大祭刚完，同回之中即迅速转入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似乎故意在瓦解任何可能成为高潮的东西。这也许是摆脱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从大面积文化异化占领区中逃逸出来的对策，当然也是他的思想倾向、艺术修养水到渠成的结果。（这倒颇能与标举“小说等于反激情的诗”的昆德拉说到一块去）作者认为人这个类的基本境遇便是“多歧路”“无凭据”“知何处”（第一回《序词》），所有的路都是让人走的，也都是捉弄人的。一切都是个匆匆而过，一切都是个不了了之。

而且人物一茬一茬地换届，但事儿还是那些，所有的老问题因不了了之反而都存在，而且流行的成了主流的、主流的成了流行的。士种不但相对古代在退化，就是书中人物也以递进的趋势在退化，贤人一代不如一代、假名士一鳌不如一鳌。人如过河之鲫，那河床却是不动的。《外史》的时间跨度很长：百年，非但不是一日长于百年，反而是百年恍如一日。横跨数省的地理幅面也没有拓宽生存空间：任何地方的人都背着权与钱这两块枷板。乡下人还是那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那样的老例。他们那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戏把他们变成了被游戏的东西，角色那乏味的命运能唤醒人们对现实和自身起一种“反讽”的惊愕吧？

如果说还有那么几个人幸免反讽的洗礼，便是那一组做人水平极高的老人了：秦老、卜老、牛老、于老者等，他们既不会做八股文，也不会诌诗文，也不懂什么经史上的学问，但他们比高翰林、范学道、景诗人（兰江）都更“文化”、更理性、更有人性的尊严和人性的温馨。《外史》中流淌着一束可以称为“老辈人口气”的语调，还不说那贯穿全篇的“世纪老人”俯瞰顽童的口气，且只说那几篇当视为全书眼目的“临终遗嘱”：王冕母叮嘱儿子不要当官、当官没有好下场，匡太公告诫匡超人将来日子顺利了切莫增添势利见识，娄焕文劝杜少卿凡事都要学其父亲……

当然作者绝无凡老皆好、建构老人乌托邦的用意。严贡生、钱麻子、成老爹都是丑陋至极的“老妖精”，胡屠户教范进、牛玉圃教牛浦郎都是教唆犯那种教而且臭不可闻。周进、范进这种“老乡原”因贴合“停滞帝国”的根性而宦海无恙，但他们那粘滞的作风只能使本已逼仄的河床淤泥更深。作者对这号老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不可调和的憎恨。

但是,就像作者偏向文化记忆而蔑视文化现状一样,作者在面对前仆后继的向往城市、追求实现自我欲望的时髦心理时,他偏爱乡村化的道德哲学。他也许并不明白只有文明进步,才会建构起合理的道德,他也许对“道德老人”过于敬重,以致于想用这种情愫来抗衡文化现状了。令人同情的是,文木老人只有理性自赎、道德自救这一张底牌了。

## 五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于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写成《儒林外史》。今见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世称“卧本”。嗣后有嘉庆二十一年的清江浦注礼阁本(“清本”)和艺古堂本(“艺本”),是“卧本”的复印本。后来的苏州潘氏清抄本(“抄本”)、苏州书局本、群玉斋本,都出于卧本。李汉秋先生认为群玉斋本只是苏州书局本“同一版模的不同版次”,当统称为苏州群玉斋本(“苏本”)。后来出现了以苏本为底本的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申一本”),直承申一本的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申二本”)、据申二本重排的商务印书馆本等等。

在没有发现金兆燕的扬州原刻本、无法断定卧本与金刻本关系之前,不妨这样认定:卧本是所有通行本的底本,《外史》的版本只有卧本这一个系统。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两案:一是增补齐省堂本妄增了四回文字,从原本第四十三回中间插入,“补”到第四十七回半回,写沈琼枝成为盐商宋为富的妾,到寺院乞仙借种等事。这个版本的翻印本很多。另一案是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亚东本”),由汪原放加新式标点符号并分段,是今见第一个正文只有五十五回的本子,将第五十六回“幽榜”摒为附录。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江风又是什么风?遗忘之风——“古人说过不曾提醒一个”!

周月亮

1995年1月于石门

2008年6月修订于北京



## 目 录

### 前 言 /001

-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001  
借名流隐括全文
-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008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014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022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028  
严监生疾终正寝
-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035  
寡妇含冤控大伯
-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041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047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053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059  
蘧公孙富室招亲

## 目

## 录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065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148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071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154
第十三回	蘧孰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077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160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083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165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089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171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095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177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01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183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07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190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13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196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19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202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124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208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130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213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136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219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142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226



		目 录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232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283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237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288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243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293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249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298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254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302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260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308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265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313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271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320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277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325

#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

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

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

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



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大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

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北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

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

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